

《東華漢學》第 17 期；81-106 頁  
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 
2013 年 6 月

## 陳亮經學述義<sup>\*</sup>

劉芝慶<sup>\*\*</sup>

### 【摘要】

本文主旨在於分析陳亮經學的特色，以及陳亮如何以經學的角度來看相關議題。就陳亮看來，經是載道之書，由經通史，重在因時應變，是陳亮一貫的立場。這個立場也影響了陳亮與朱熹的王霸之辨，陳亮與朱熹所論多有不合，朱熹重三代天理，批判漢唐人欲；陳亮則認為漢唐雖不如三代美善，但仍有道可觀，不可全部抹殺，是以二人所論，頗有不同。然細觀朱熹與陳亮的差異，正是因為他們看待經史的角度不同所致，本文即是以陳亮的經學為出發點，來探討這些問題。

關鍵字：陳亮、經學、朱熹、王通

---

\* 本文的寫作與修改，受益於陳逢源老師的建議甚多。此外，審查者也給予許多中肯的意見，得以讓論文更加完整，謹此致謝。

\*\*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

## 一、學者眼中的陳亮

陳亮學術思想特徵為何？概觀學界對陳亮的研究，或從史學立場出發，指出陳亮重歷史、講時變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辨以達時措之宜，正是陳亮歷史意識的重心；<sup>1</sup>又或是認為陳亮乃所謂「功利主義」、「事功主義」或「英雄主義」的代表，不尚浮辭，突出事功實際，乃至於重英雄重才氣。田浩就說在更廣、更嚴密的的意義上，陳亮可以說是功利主義者。在漢語中，功利主義首先強調兩個相關目標：達到具體的結果、後果（功），增大政府提供給社會的利益好處（利），陳亮的思想與此頗為相符。<sup>2</sup>蕭公權與勞思光同樣是以這種角度來看陳亮，或曰功利思想，或云事功學派，所言或有不同，但就講究事功實效這點而言，並無二致。<sup>3</sup>又如牟宗三以朱陳王霸之辨的角度切入，陳亮所論者為英雄生命才氣之震動，相較於正以誠意為主的理學家、相較於朱子純以主觀道德論英雄，以致於不能正視生命之獨特處，忽視漢唐功業，陳亮則是企圖縮合義利王霸為一路，其底子仍為英雄主義，故凡是英雄皆有價值，且偏重生命強度的實然狀態，對於理性不能有積極的正視。<sup>4</sup>除此之外，也有學者指出陳亮雖講事功，亦不廢內心之學，因此陳亮才屢言「人心之正」、「心者治之原」，畢竟鍛鍊內心，正是為了以修身擴充於外在政事，修身治國平天下，人心正而天下正。<sup>5</sup>

<sup>1</sup> 董平、劉宏章，《陳亮評傳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137-183。

盧敦基，《人龍文虎——陳亮傳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82-91。

<sup>2</sup> 關於陳亮功利主義研究文獻的回顧，可參美·田浩（Hoyt Tillman）著，姜長蘇譯，《功利主義儒家——陳亮對朱熹的挑戰》（江蘇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 5-11。

<sup>3</sup> 蕭公權，《中國政治思想史》（上冊）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82），頁 493-496。勞思光，《中國哲學史》（第三冊上）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1），頁 335-346。

<sup>4</sup> 牟宗三，《政道與治道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1），頁 225-250。

<sup>5</sup> 董平、劉宏章，《陳亮評傳》，頁 210-219。陳立驤，〈朱子與陳亮的歷史

相比於上述的路數，目前學界對陳亮經學的研究雖不能說沒有，但確實較少。諸如何俊就以陳亮藉由解經批判理學家的角度，來探討其儒學建構，<sup>6</sup>董平、劉宏章則是以史學的視野涵攝經學，指出陳亮把經視為是史的一種，將《六經》與諸史合為一同，陳亮的用意在於「記述天人之際的基礎上充份體現聖人『相時宜以立民極』的根本精神。正是這種參稽事勢之變而因時制度的精神，才是真正的聖人之道，才是《六經》之權威性所在，堪為萬世法程。」<sup>7</sup>由此可知，不論是以經學批判論敵，還是以經學講時變、經史同歸，這些研究都指出了陳亮經學的重要性。那麼，值得再追問的是，陳亮看重經學，是否只能就「參稽事勢之變而因時制度」而觀？經學在陳亮的學術思想中，與史學的關係又是什麼？若將經學與上述所言的正心、事功、乃於朱陳王霸之變連結，又該如何解釋彼此間的關係？以經學來看這些觀點，又能看出什麼的意義？本文的研究，即是以上述疑問為出發點，指出經學實為陳亮學術思想的重心之一，由經通史，藉由經史而求變，不過變又不能浮濫無依，而是必須權歸於正，所以陳亮才看重正心，心正則權正，只是心又該從何「正」起？正心的標準又在哪裡？這就有賴於理解經中所涵之道，以道修心正心，再由正心來點化調整權變，如此種種，環環相扣，缺一不可。因此以經學出發，論證其間過程，並重探朱陳王霸之辨，即本文主旨所在。

---

評論——以「漢唐之爭」為中心的探討〉，收於盧敦基、陳永革編，《陳亮研究——永康學派與浙江精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91-98。就文學來講，目前學界對陳亮詞學亦多有關注，論述不少，只是因為並非本文要處理的部分，故不便於放在正文中。陳亮詞學研究，可參龔鵬程，〈詞史上的陳亮〉、吳蓓，〈陳亮詞論〉、胡浙平，〈格高調自逸·品正情亦醇——論陳亮「人格精神」及其在詩詞中的展現〉，三文皆收於盧敦基、陳永革編，《陳亮研究——永康學派與浙江精神》。蘇淑芬，〈陳亮政論詞研究〉，《國立彰化師大國文學誌》第四期（2000.12），頁165-192。董平、劉宏章，《陳亮評傳》，頁351-379。

<sup>6</sup> 何俊，〈陳亮解經、系譜與南宋儒學的建構〉，收於盧敦基、陳永革編，《陳亮研究——永康學派與浙江精神》，頁52-59。

<sup>7</sup> 董平、劉宏章，《陳亮評傳》，頁150-151。

## 二、以經通史，因史求變——上溯王通之學

陳亮曾著《六經發題》，其中《易》一文已闕。而在其它經書中，陳亮一再表示經書的重要性，如他說《書》是：「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，取其概於道者百篇，而垂萬世之訓，其文理密察，本末具舉，蓋有待於後之君子。」<sup>8</sup>《詩》：「聖人之於《詩》，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，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。」<sup>9</sup>《春秋》：「是以盡事物之情，達時措之宜，正以等之，恕以通之，直而行之，曲而暢之。」<sup>10</sup>《周禮》雖經秦火，已非其全，但尚可考證內容真偽，大體來講則是「《周禮》一書，先王之遺制具在。」<sup>11</sup>至於《禮記》一書，雖雜出漢儒之手，但就《禮記·曲禮》諸篇而觀，所載亦不過日用飲食、洒掃應對之常，「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，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」，是以「夫禮者，學之實地也。」<sup>12</sup>在陳亮觀念裡，《六經》是切合於人世，是具體可用、是學之實地。因此就古今來看，不但是垂萬世之訓，也是先王遺制所在；就人事來講，則可使天下復性情之正，又或是適用於日用飲食、洒掃應對，這就指出了經典具有聯繫當下（平施於日用之間）與過去（先王遺制具在）的功能，還能有放諸未來的延續性（有待於後之君子）。若然如此，古代聖人遺意，如何展現在經典當中，為時人所用，關鍵就在於明時知變。意即不但要明當世之時，事物之理，還要懂得古代先王立政之意，因循革益而變通，陳亮說：

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，發言立政，順民之心，因時之宜，處其常而不惰，遇其變而天下安之。今載之《書》者皆是也。

<sup>8</sup> 宋·陳亮，《六經發題》，收於《陳亮集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82。

<sup>9</sup> 同前註，頁83。

<sup>10</sup> 同前註，頁85。

<sup>11</sup> 同前註，頁83。

<sup>12</sup> 同前註，頁84。

（《周禮》）……始夫子之言曰：「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，自是變通，至於百世而不窮，而豈知其至此極也！<sup>13</sup>

或說經乃先王明事物之故，因時之宜而作，又或是引孔子繼周之語，以言因損革益，這些都說明經書不止是訓詁章句的注疏學問而已，而是講究實用的：「乃區區於章句、訓詁之末，豈聖人之心也哉！」<sup>14</sup>「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，其何足以知此哉！」<sup>15</sup>《六經》實乃萬世法典，當然萬世法並非僵化固度不變，剛好相反，《六經》之旨就是講求變通的，是因時因勢、革益求新的，曾是活生生的歷史世界，並非只是經生分篇析句的章句、訓詁之學。《六經發題》裡雖未言《易》，但陳亮在〈告先聖文〉就一再提及包括《易》在內的《六經》，他說天下之理具於《易》，治道之本末著之《洪範》，其它諸如：「《詩》之喜怒哀樂，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」、「帝王繼世之用，《書》載之明矣」、「而《春秋》所以備四王之制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。」<sup>16</sup>《六經》特性各有不同，如《詩》是講喜怒哀樂，《春秋》是備四王之制，但不管如何，就其同者而觀之，《六經》之重要性在於達時知事、經世致用。經是實學，所記載乃是先王之制，也是人倫日用之事，陳亮推崇《六經》，其因在此。

上述《六經發題》引《尚書》一語，事實上就舉出了一個重要消息：「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，取其概於道者百篇……」，以道觀古今之變，又將道記述在《書》中，是以《書》乃載道之書，不只《書》如此，其餘諸經都是如此。例如陳亮在〈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〉就說「道之在天下，至公而已矣」，接著便引《易》《禮》為證；<sup>17</sup>又例如他講《詩》是「道之在天下，平施於日用之間」<sup>18</sup>、《春秋》則是「天道之全」<sup>19</sup>，

<sup>13</sup> 宋·陳亮，《六經發題》，《陳亮集》，頁 82、83。

<sup>14</sup> 同前註，頁 83。

<sup>15</sup> 同前註，頁 82。

<sup>16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告先聖文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 318。

<sup>17</sup> 宋·陳亮，〈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 281。

<sup>18</sup> 宋·陳亮，《六經發題》，頁 82。

這些都說明了，陳亮視《六經》為載道之書，並且把道放在天地事物人倫日用之中。道在經中的展現，一方面，是「是以盡事物之情，達時措之宜，正以等之，恕以通之，直而行之，曲而暢之」，以此得天下大公的「天道之全」<sup>20</sup>（《春秋》）；另一方面，也是「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，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」<sup>21</sup>（《詩》）。由此可知，道會隨著或異或同的事物不斷延續，卻沒有超越的性質，道是因應不同事物時空，或在古人言行洒掃應對之中，或在帝王繼世之制裡，變動不居，時現時隱，因此道在事中，都是度時觀變的結果。

除此之外，陳亮講經學，事實上是承繼著隋末王通而來，他在〈類次文中子引〉、〈書類次文中子後〉就說得很清楚，陳亮一再表明自己對於王通的仰慕：

故夫功用之淺深，三才之去就，變故之相生，理數之相乘，其事有不可不載，其變有不可不備者，往往汨於記注之書。天地之經，紛紛然不可以復正，文中子始正之，續經之作，孔氏之志也，世胡足以知之哉！<sup>22</sup>

王通《續六經》至唐末便已亡佚，今只存《中說》一書。《中說》乃依《論語》體例，為弟子記其師王通平日行言而成。相較於《論語》多論學、論政、論禮樂，《中說》未免雜亂無章，缺乏次序，所以陳亮重新編訂，取當時通行的阮氏本、龔氏本，「正其本文，以類相從，次為十

<sup>19</sup> 宋·陳亮，《六經發題》，頁85。

<sup>20</sup> 同前註。

<sup>21</sup> 同前註，頁82。

<sup>22</sup> 宋·陳亮，〈類次文中子引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200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〈類次文中子引〉文後提到寫作時間為「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，永康陳亮書」，淳熙乙巳即淳熙十二年（1185），文章又附有呂祖謙答書，乃呂祖謙與陳亮商榷討論。但呂祖謙死於淳熙八年（1181），不可能在淳熙十二年還見到陳亮此文，經束景南的考證推測，包括〈類次文中子引〉、〈書類次文中子後〉、〈書文中子附錄後〉在內文章可能作於乾道九年（1173），而在陳亮與朱熹論證結束之後的淳熙十二年，陳亮修改了〈類次文中子引〉，因此才有文後的「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，永康陳亮書」。可參束景南，《朱子大傳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），頁613-614。

六篇，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，往往不錄，以為王氏正書。」<sup>23</sup>但不管是《中說》也好、《續六經》也罷，都代表了王通觀世變、察古今、論經史的特色。就陳亮看來，經本為載道明變之書，只是後儒不明於此，偏在章句訓詁中鑽研，以致於「其事有不可不載，其變有不可不備者，往往汨於記注之書」，於是經書宗旨一去而不返，難以復正，王通有鑑於此，通時明變，審勢度要，其續經之作，「孔氏之志也」。王通續經之作，正為孔子之志，陳亮又以此作為生命志業，繼續王通的遺願。由此可知，王通之續經，正如陳亮之講經，都是把經書視為通變明道之書，而不是把經視為考證記注的技術展現。<sup>24</sup>值得注意的是，陳亮上承王通之學，受其影響又再有發輝，所以他在與朱熹論王霸之辨時，語多鑿柄，頗不相契，朱熹也看出陳亮此說源於王通，是以對王通亦多所非議，朱熹說：「文中子《續經》，猶小兒豎瓦屋然。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，因遂尊崇其書。」<sup>25</sup>「世儒」謂誰，雖非明指，不過陳亮尊崇王通，更特別標明《續經》，朱熹雖不一定是針對陳亮個人批評，但將陳亮視為「世儒」的一員（請特別注意朱熹曾要求陳亮要當「醇儒」。「醇儒」與「世儒」相對，用意至為明顯。「醇儒」之說，詳見下節），是很有可能的。朱熹又說：「問文中子之學。曰：『它有這箇意思，以為堯舜三代，也只與後世一般，也只是偶然做得著。』曰：『它續《詩》續《書》，意只如此』……曰：『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。』……。」<sup>26</sup>同也樣是將陳亮之學上溯王通。

<sup>23</sup> 宋·陳亮，〈類次文中子引〉，頁 199。

<sup>24</sup> 關於王通對陳亮的影響，目前學術界論述頗多，本文重在詳人所略，略人所詳，因此才只就經學一項來談。二人學術思想的傳承關係，可參董平、劉宏章，《陳亮評傳》，頁 381-405。龔鵬程，《唐代思潮》（宜蘭：佛光人文社會學院，2001），頁 54-58。何俊，〈陳亮解經、系譜與南宋儒學的建構〉，收於盧敦基、陳永革編，《陳亮研究——永康學派與浙江精神》，頁 56-59。美·田浩著，姜長蘇譯，《功利主義儒家——陳亮對朱熹的挑戰》，頁 74-76。

<sup>25</sup> 宋·黎靖德編，《朱子語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），頁 3270。

<sup>26</sup> 同前註，頁 3269。

經既為載道明變，《六經》事實上又只是先秦政典，乃先王度其時勢而成，有其時代背景。若然如此，從《六經》完成以後到當下（陳亮的時代）之間的千餘百年，道又在何處？又如何展現？若就朱熹的看法來看，這些階段，即便有漢武帝唐太宗等盛世，道卻依舊不存，只是私欲橫流而已；陳亮卻非如此，他認為答案就在史中，史與道的關係，類似經與道的關係；經跟史，又是時間先後的次序問題，陳亮在此論證頗為曲折。史之所以能見道，是因為史與經一樣，都是道的通權達變。故史中所見，與《六經》之旨類似，皆是當時人揆古今之變，得道所行的結果。換句話說，經是道之變通，史當然也是。若由經而通史，再因史求變而明經，經史互輔互證，自然更能明道，因此論史、求經、明道，就成了一種連續性、前後呼應的關係。

陳亮又另外指出道在事中，事之外無道：

夫道之在天下，何物非道！千塗萬轍，因事作則……。

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，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……。

夫道，非出於形氣之表，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。<sup>27</sup>

何物非道、常行於事物之間，故道在事物之間，這也是本節一開頭所引《六經》，如《詩》是平施於日用之間者、《春秋》是盡事物之情，達時措之宜、《周禮》是先王遺制、《禮記·曲禮》所載亦不過日用飲食洒掃應對之常等等，即是《六經》主旨精義所在，只是學者卻偏重於以記注考證解經，忽略了這個大關節、大關鍵，導致經義不明。事實上經書宗旨正具體展現在後來的歷史中，所以陳亮才有《三國紀年》之作，他在序中先是提到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周禮》、《詩》之作：

昔者孔子適周觀禮，晚而有述焉。上古之初，不可詳矣，著其變之大者，《易》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。至於《書》，斷自唐虞，定其深切著明者為百篇。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，是故之杞之宋，而典禮無復存者，故孔子屢嘆之。周封二王之後，使

<sup>27</sup> 宋·陳亮，〈與應仲實〉、〈勉彊行道大有功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253、79。

各修先代之禮物，庶幾後世有考焉，夫豈知其至此極哉！於是始定《周禮》，又刪取周家之《詩》以具其興亡，而列國之風化繫焉。<sup>28</sup>

經乃孔子刪訂編修，目的是為了達時觀變，或具興亡、列國之風，或知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。其中《春秋》又明載當時史事，為孔子傷世變哀其世而著：「陳恒弑其君，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，可以震動天下矣，魯君不之聽，孔子傷其變不可為也，舉其意而寓之《春秋》」，所以「《春秋》，事幾之衡石，世變之砥柱也。」<sup>29</sup>《春秋》既載史事，亦有寓意，是孔子觀世變而成，而陳亮又說《易》是孔子「著其變之大者」，前引〈告先聖文〉也說天下之理具於《易》，於是《易》與《春秋》就變成一種相即相明的關係，《易》因《春秋》而顯，《春秋》與《易》之理相通：「故《春秋》，《易》之著者也，百王於是取則焉。」<sup>30</sup>

可是，不論是《春秋》、《易》互通也好，又或是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也罷，基本上《六經》都是明變載道的，因為《六經》涵括了當時的事，道便在這些事裡（如前引道在事中，事之外無道），後人若依此原則而作，自得達其通變以明道。因此《六經》以後的歷史，照理來講也應該有其「事」，自然也能有道。只是即便道在事中，卻取決於後人著史的心態，見道與否，在於後人能否明瞭先王開物成務、孔子編修《六經》的精神。如前所言，一來學者偏重考據解經，是以經義不彰；二來後人寫史，卻不明經義史法，以致於後來的史著不能盡情地發揮類似經的功能：

漢興九十餘載，司馬遷世為史官，定論述之體，為司馬氏《史記》，其所存高矣，出意任情，不可法也，史氏之失其源流，自遷始焉。故自麟止以來，上下千五六百年，其變何可勝道，散諸天地之間，學者自為紛紛矣。夫善可為法，惡可為戒，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

<sup>28</sup> 宋·陳亮，〈三國紀年序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139。

<sup>29</sup> 同前註，頁140。

<sup>30</sup> 同前註。

疑似之情，治亂興衰之跡，使來者有稽焉，愈於無史矣，豈可謂史法具此哉！<sup>31</sup>

就陳亮看來，司馬遷著《史記》，定論述之體，所存雖高，事實上卻失去了孔子刪修《六經》以展「世變之砥柱」、「具其興亡」、「深切著明」的寓意。這種寓意其實就是觀變知時、就是明道，所以他才說司馬遷「出意任情，不可為法。史氏之失其源流，自遷始焉」。「麟止」，指孔子《春秋》秋魯哀公十四年獲麟絕筆，到陳亮的年代約已千五六百年，其間紛變多矣，而學者紛紛著史，皆不可謂史法：「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！」有鑑於此，陳亮才著有《三國紀年》，寫史論史，欲觀世變，明其統續，正如他在〈類次文中子引〉所言：「天地之經，紛紛然不可以復正，文中子始正之，續經之作，孔氏之志也」，陳亮之著史，正是為了續孔子之經，以史續經。<sup>32</sup>他在自序中特別標舉《春秋》，亦是沿承孔子著史觀世的作法，《三國紀年》又合漢魏吳以正天下、又說：「嗚呼！漢之有魏，魏之有晉，晉之有五胡，讀吾書者可知之矣！」正彷彿「孔子傷其變不可為也，舉其意而寓之《春秋》」的意義。

孔子傷其變而成經，陳亮同樣也是觀世變而論史，正如他在《漢論·七制》中，先以王通之說發問：「或問曰：『文中子稱七制之主有大功，而不言其德者，何也？』」（陳亮）曰：『考論人物，要當循其世變而觀之，不可以一律例也。』<sup>33</sup>七制之說起於王通，據朱子所言，即漢高祖、文帝、武帝、宣帝、光武、明帝、章帝等七人所訂定的典章制度。<sup>34</sup>

<sup>31</sup> 宋·陳亮，〈三國紀年序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140。

<sup>32</sup> 美·田浩就指出，陳亮意識到在歷史變遷中，「道」並非固定不變的，例如孔子著《春秋》，因應時勢背景之故，即對三代之道或增或損。而包括孟子與王通在內的後來學者，同樣也沿用了這種思維，是以陳亮認同王通續經之意，即是繼承孔子事業。本文要進一步指出的是，陳亮論史，同樣也承繼了這種思維，換言之，論史／續經／明道，是一種彼此相呼應的關係。美·田浩著，姜長蘇譯，《功利主義儒家——陳亮對朱熹的挑戰》，頁7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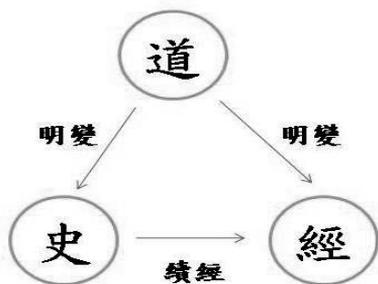
<sup>33</sup> 宋·陳亮，《漢論·七制》，《陳亮集》，頁151。

<sup>34</sup> 宋·黎靖德編，《朱子語類》，頁3256。

陳亮以七制為例，說明論史當循世變而觀，不可一概而論。類似的看法，也在《漢論·章帝》中可見，陳亮先說三代之治，忠而質，質而文，並非故意相反，而是「變焉而迭相救也，是以變而之善，周之法悉矣」，<sup>35</sup> 其後漢高祖懲秦人煩苛之政，變之以寬仁；孝宣懲武帝虛偽之弊，變之以總覈；光武懲韓彭之弊，變之以不任功臣，「此皆其善變焉者也」。以變觀史，從史而得世情，此乃陳亮論史宗旨，這與孔子作經之意正同，是以陳亮跟他理解的王通類似，都是企圖上承孔子，論史正是為了續經，從經到史，則道已在其中矣。

由此可知，以史續經而觀世變，正是陳亮一向的主張。反過來講，就是經通於史。就歷程上的序列而言，經與史，經在前，史在後，孔子編經著經在前，陳亮論史寫史在後，陳亮發明孔子之意，是以續經，論史是為了明白《六經》之旨，這是一個時間前後的關係。陳亮論經史間的關係，其中頗有辨證，不能簡單地將經等同史（經史不同，正如陳亮對朱熹說兩者雖合於道，可是經中之三代做得盡，是金；諸史之漢唐帝王做得不盡，是銀，金銀雖然都不是鐵，都有道存焉，但兩者當然也不對等，詳見下節）。

為方便表述，不妨以圖示說明：



不論是經或史，陳亮都是以通變的眼光將之貫串。在此其中，「道」並不是永恆不變的事物，而是因時應勢，變動不居的，這由反映在經中所

<sup>35</sup> 宋·陳亮，《漢論·章帝》，《陳亮集》，頁161。

載之道便可得見，而道因明變體現在經，道同樣也藉由明變而展現於史，道通於經，亦可通於史。

至於史與經的關係，陳亮受到王通的啟發，論史是為了續經，都是為了明世變、通權衡，最後得觀古往今來，上下經史以得道。換句話說，就「道—經」來講，經是古人通時達變之後，展現道的載體，故經是載道之書，經中之事，因不同情況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，《六經》之所以各有特色，其因在此；就「道—史」來看，正如經裡有當時之事，經可見道，史亦各有其事，當然也可見道。《六經》的時代，道的體現是經，《六經》以後的時代，道的體現則是史，但這種體現並非僵固不變，同樣也是審時度勢的結果。<sup>36</sup>同理，每階段的史也是不同的，是以陳亮論王霸，認為曹操與漢唐不同，也是由於這個緣故。

<sup>36</sup> 陳亮論史說經，很容易會讓人聯想到章學誠「六經皆史」之說，董平、劉宏章於合著的《陳亮評傳》中說：「在陳亮那裡，確乎已有『六經皆史』的觀念，儘管這一命題直至清代的章學誠才被明確提了出來。」陳亮與章學誠對經史看法的異同，或許是一個值得探究，饒富趣味的學術史、思想史問題，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幾點：一、章學誠提出「六經皆史」，是否有受陳亮的影響？他對陳亮著作的熟悉度為何？又或者只是觀點上的雷同巧合？二、兩者面臨的學術環境不同。章學誠是針對考證風氣而發，清代漢學家認為道在六經中，必須藉考證技術以明道；陳亮則無此困擾，他針對的是理學家式的問題，這反而不是當時章學誠所關注的。況且，陳亮特地標出道在事中、事之外無道，章學誠之論，是否也曾措意於此？三、關於「六經皆史」的解釋，目前學界看法仍有差異，若依汪榮祖之說，則章學誠所謂的「道」，仍是指不變的道體。六經與史一樣，都只是載道之器，經與史不能直接等於道，無論是今史還是古史（六經便是古史之一），史都是載道之器，經與史根本不可分、也不必分，故章學誠並非如余英時等人所說，乃以史代經或以史抗經，六經皆史，絕無抑經、抗經之意。若是如此，則章學誠與陳亮之說，差異更大。以上這些問題，都有待進一步疏理。本文的主旨，當然不在於探究這些問題，可是有聞闕疑，在此亦不妨提出，有待日後進行更多討論。上述觀點或可參董平、劉宏章，《陳亮評傳》，頁 96-101。余英時，《論戴震與章學誠——清代中期學術思想研究》（臺北：東大出版社，1996），頁 53-66。汪榮祖，〈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再議〉，收於氏著，《史學九章》（臺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 311-329。林時民，《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——劉知幾與章學誠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2），頁 66-69。

此外，論史續經，得經之精神，故經史必須互相參照才能知「道」，陳亮在〈錢叔因墓碣銘〉就說：

洪荒之初，聖賢繼作，道統日以修明，雖時有治亂，而道無一日不在天下也。而戰國、秦、漢以來，千五百年之間，此道安在？……《六經》、諸史，反復推究，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，而識觀象之妙，時措之宜，如長江大河，渾渾浩浩，盡收眾流而萬古不能盡也。<sup>37</sup>

道既已在《六經》中，成於戰國以前，那麼戰國秦漢以後，道又何在？再者，《六經》是先王因應當時而作，而自戰國以後，時勢不同，又該如何？答案就在於要從戰國以後的歷史中（即諸史），與《六經》反復推究，以史推求經義，由經通史，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、以見時措之宜觀象之妙。

在這樣的原則之上，陳亮與朱熹開展的王霸之辨，二人論述多有不合，各持己見，正起因於陳亮對道、經、史的看法與朱熹不同。其中陳亮將經學視為道與史之間的重要關鍵，實與朱熹差異甚大。更有甚者，在陳亮的論述中，「經」與「道」失去了價值的永恆性與超越性，這也是朱熹不能贊同的。

### 三、權歸於正，正起於心——重探朱陳之辨

朱熹與陳亮交往始於淳熙九年（1182），其後書信往返，對於王霸之辨的深入討論，則起自淳熙十一年（1184），結束於淳熙十三年（1186）。<sup>38</sup>許多研究者皆已指出當時二人社會地位相距甚大，當時朱熹為理學領袖，陳亮不過是一個書生，無官無職，<sup>39</sup>加上他狂豪之氣太

<sup>37</sup> 宋·陳亮：〈錢叔因墓碣銘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382。

<sup>38</sup> 清·王懋竑，《朱子年譜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59），頁111、133。

<sup>39</sup> 美·田浩，《朱熹的思維世界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168-169。

露，不守法度，又因唐仲友一事與朱熹產生嫌隙。<sup>40</sup>淳熙十一年陳亮入獄，身心受創，怎料出獄後又遇強盜，根據他後來的追述：「自棘寺歸，閉門不與人交往，以妻弟之故，一出數日，便為兇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，一命存亡僅絲髮許，而告之州縣，漠然不應，不知今年是甚運數！」<sup>41</sup>不但差點死在強盜手上，官府也未緝捕兇手，陳亮驚魂未定之餘，感慨自己運勢不好。朱熹收到陳亮近況告知，深感訝異，安慰數句之後，話鋒一轉，開始教訓起陳亮的個性與行事風格，他說：

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，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，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，亦以法度之外相處，不敢進其逆耳之論，每有規諷，必宛轉回互，巧為之說，然後敢發。平日狂妄，深竊疑之，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。<sup>42</sup>

由此可見，朱熹對陳亮言行多所不滿，以致於稱其不遵法度、不樂聞儒生禮法。朱熹又說這些話本打算當面告知，不料陳亮遭逢厄運，禍竟數至，可是仔細深思，事因或其來有自，也可能跟陳亮性格易招禍有關：「今茲之故，雖不知所由，或未必有以召之，然平日之所積，似亦不為無以集眾尤而信讒口者矣。老兄高明剛決，非吝於改過者，願以愚言思之，紉去義利雙行，王霸並用之說，而從事懲忿窒慾，遷善改過之事，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……。」<sup>43</sup>陳亮接到來回信，先解釋自己之所以讓人產生「自處於法度之外」形象的原因，他說自己二十歲時與呂祖謙同試漕臺，不過數年，呂祖謙已高高在上，為一世師表，自己卻落落寡歡，名位不顯，呂祖謙不以為意，依舊善待他親近他，視他為友，可是旁人卻不如此：「旁觀者皆為之嘻笑，已而嘆駭，已而怒罵。雖其徒甚親近

<sup>40</sup> 董平、劉宏章，《陳亮評傳》，頁 96-101。

<sup>41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又乙巳春書之一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 271。亦可見〈又甲辰秋書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 271。關於陳亮第一次入獄經過與出獄後遇盜的經過，可參董平、劉宏章，《陳亮評傳》，頁 110-119。

<sup>42</sup> 宋·朱熹，〈與陳同甫四〉，收於陳俊民校編，《朱子文集》（臺北：德富文教基金會，2000），頁 1455。

<sup>43</sup> 同前註。

者，亦皆睨視不平，或以為兼愛太泛，或以為招合異類……。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，謗議沸騰，譏刺百出，亮又以為之揚揚焉以資一笑。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，大略皆出於此耳。」<sup>44</sup> 辨解之意，極為明顯。因此，他也不同意朱熹的建議，他認為自己與所謂醇儒本就不同，畢竟研窮義理，辨析古今，涵養為正，他或許對此道有虧；若就堂堂正正，推倒一世之智勇，開拓萬古之心胸，「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，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」，<sup>45</sup> 則陳亮自言差可勝焉，不遜於人，朱熹不瞭解他，就不應該提出不適合他的建議，至於朱熹所謂「義利雙行王霸並用」之說，更是有所誤會。書信往返至此，開始正式進入兩人王霸之辨的核心。陳亮的答覆指出，從先秦孟荀論義利王霸開始，漢唐諸儒皆未能深察，至於本朝伊洛諸公以降，以天理人欲辨析，此說方才大明，但仍有未達，例如說三代以道德行治天下，漢唐則以智力把持天下，已不公允。又說三代專行天理，漢唐只行人欲，則更是不妥。陳亮認為漢唐亦有與天理暗合者，是以政權能維持長久，否則的話，「千五百年之間，天地亦是架漏過時，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，萬物何以阜蕃，而道何以常存乎？」<sup>46</sup> 因此所謂的王霸，就陳亮看來，朱熹等人的批評用來講曹操等人還可以，若是漢唐也是如此，就不夠公正合理：「諸儒之人，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，以斷漢唐，豈不冤哉！」<sup>47</sup> 因為陳亮認為漢唐之君皆是發於英雄之心，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，只是時有轉移，其間不無滲漏，無法如三代做得如此完善而已，不能因為做得不盡，就完全否定有天理、道在其中的可能。<sup>48</sup>

朱熹顯然仍不同意陳亮的解釋，說他只是以成敗論英雄，看到漢唐建立功業，就以為有道在焉。朱熹指出漢唐皇帝仍是出於人欲，假仁義以行其私，所以不能以結果論王霸。因此若說漢唐得道，當非朱熹所能

<sup>44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又甲辰秋書〉，頁 268。

<sup>45</sup> 同前註。

<sup>46</sup> 同前註，頁 269。

<sup>47</sup> 同前註，頁 270。

<sup>48</sup> 同前註，頁 268-269。

認同：「千五百年之間，正坐如此，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，其間雖或不無小康，而堯、舜、三王、周公、孔子所傳之道，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」「漢唐所謂賢君，何嘗有一分氣力扶補得他耶！」<sup>49</sup>就此來看，朱熹認為的「道」，具有永恆的客觀價值，不因人為有所增損，不會隨著時移世易而擅自更改，<sup>50</sup>這就跟陳亮認為是因時應勢、隨權變易有所不同。

關於王霸之說，陳亮早在太學裡寫的〈問皇帝王霸之道〉一文裡，已說之甚明。他認黃帝、堯、舜為帝道，禹湯文武因時應變用之則為王道，王道衰，五霸迭出，則是霸道，彼此各有其道，分門多歧，「無怪乎諸子百家之為是紛紛也。」<sup>51</sup>而孔子敘《書》、作《春秋》，上述皇帝，下貶霸道，取法乎中，以王道用之，漢唐制度皆源於經，而漢唐制度又由史可見，漢唐立國之宏規出於經，後人又從史中得見漢唐盛世，史與經的連續性關係，此說甚明。但因漢唐趨近事功，又不廢霸道，而是王霸雜之。宋朝用儒以治天下，王道之說大倡，「然而德澤有餘而事功不足」。因此他主張王道與霸道結合，皆不偏廢，「王霸之雜，事功之會，有可以裨王道之闕而出乎富強之外者，願與諸君通古今而論之，以待上之采擇。」<sup>52</sup>此說乍看之下，似乎正符合朱熹所批評的「義利雙行，王霸並用」。但前已言之，陳亮不同意朱熹的看法，他認為他講王霸，是直上直下，霸道是補王道之闕，王道又是扶正霸道。更何況雜霸

<sup>49</sup> 宋·朱熹，〈與陳同甫四〉，頁 1457-1458。

<sup>50</sup> 朱熹講王霸之辨，其實也是順著他的義利之辨來講的。基本上朱熹視「道」為人、物的性命根源，天地因之運行不已，「道」可作為人類德性價值的形上依據，至於「義」則為天理天道的呈現，是不可參雜其它成份、是不可變易的價值標準。所以朱熹才嚴格區別「義、利」「王、霸」之分，強調自我德性之修養與堅持，由己身己心出發的道德動機，為義或為利，正是「王」與「霸」的重要判準。可參傅玲玲，〈從朱熹與陳亮之辯論論朱熹的價值觀〉，收於《哲學與文化》第卅二卷第七期（2005.7），頁 59-78。張永雋，〈朱熹「義利之辨」之倫理價值觀探源〉，收於《哲學與文化》第廿八卷第一期（2001.1），頁 1-10。

<sup>51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問皇帝王霸之道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 136。

<sup>52</sup> 同前註。

又出於王道，「謂之雜霸者，其道固本於王也。」<sup>53</sup>王霸並非完全不相融的兩端，是可以相輔相成的，是以陳亮論王霸，有自身理論依循，並非如朱子所言，是一昧只重成敗結果。

陳亮對王霸的看法，正源於他的經學。在前面一節已經提過，經是通於史的，可是歷史現象複雜紛紜，道一但投射其中，往往呈現不同的面貌。論史者自當在多變的史事中求其宗旨，以通大道，所以就要觀勢審時度變，不能一概抹殺後代歷史，認為今不如古、史不如經。畢竟道在事中，事之外無道：「夫道，非出於形氣之表，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」<sup>54</sup>，《六經》記載了《六經》當時的事，《六經》之後的史，自然也記載之後的事，並不會因為沒有了《六經》，事就不存在。也就是說，漢唐之制雖不純於王道，卻是可以輔佐王道的，王道就是三代之法，三代之法就存於六經裡，所以陳亮才說：「《皇墳》、《帝典》，吾不得而識矣，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，終危邦也。如不得已，其兩漢之制乎！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，誠亂也已。」<sup>55</sup>先於《六經》，卻早已亡佚（或者根本只是後世學者想像）的《皇墳》、《帝典》既不得而見，則三代之道自然只能在《六經》中求，而且不以三代之法統治天下，終究不正，仍屬危邦。至於兩漢之制（雜霸輔佐王道、王霸之雜）雖屬不得已，但若不能用兩漢之制輔天下，依舊會衰亂。此外，前引〈問皇帝王霸之道〉亦說孔子知時變而作《書》、《春秋》，以彰明王道，但後代漢唐君王同樣也要通權達變，從六經中求得大道。只是與孔子時代不同的是，漢唐君王因應不同時勢背景之故，不但要用王道，也要以霸道補闕，這就是明變、就是因時制宜，因此宋朝正應取法於此。更進一步來講，宋朝之所取法者，正是從漢唐歷史中而得知，而這些事，事實上與六經類同，皆有道存焉。

<sup>53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又甲辰秋書〉，頁 270。

<sup>54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勉彊行道大有功〉，頁 79。

<sup>55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又乙巳春書之二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 276。

以霸道輔王道，雜霸又本於王道，就王道來講，霸道其實就是一種「權」。陳亮論史，是非常重權的，因為史事人物百端多變，不可能只用一種標準去衡量。歷史人物行為處世，更是要講究通權達變，不能拘泥、食古不化：「英雄之士，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，則其未及為者，蓋不可以常理論矣」<sup>56</sup>三代漢唐之王霸，正該由此來觀，陳亮在給朱熹的回信中一再指出：「某大概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，漢唐做不到盡者也」<sup>57</sup>，三代為正道、王道，即後來孔子《六經》所言之道，故做得盡，但後代歷史沿革變化，不可能同等於三代，所以史不可能同於經。漢唐君王通權明變，以霸道輔王道，相較於三代雖做不到盡，卻也不該完全抹殺，所以陳亮又以九轉丹砂、點鐵成金為喻，窺得史變，得知漢唐頗有暗合三代之處，是點鐵成金。反過來講，不能因為識得三代盡善盡美，就說漢唐無絲毫可取，「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為鐵也。」<sup>58</sup>三代是金，漢唐是銀，銀雖不如金，仍不可將銀作鐵。而道在三代展現，是做得盡，是金，三代之道，俱在經中；道在漢唐展現，做得不盡，是銀，這在漢唐諸史中可見，故不能說漢唐無道，所以陳亮才又說：「亮大意以為本領宏闊，工夫至到，便做得三代；有本領無工夫，只做得漢唐」<sup>59</sup>。至於漢唐諸史則是三代之道的權變，「做得不盡」也是「做得盡」之權變，是故經雖通於史，仍應審時度勢，不可一味地固執死守，而是必須知道明達時變，經史通權的道理，「本末感應，只是一理」<sup>60</sup>。陳亮說：

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，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，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，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，而我獨卓然而有見，無乃甚高而孤乎！宜亮之不能心服也。<sup>61</sup>

<sup>56</sup> 宋·陳亮，《酌古論·孔明上》，《陳亮集》，頁47。

<sup>57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又乙巳春書之二〉，頁276。

<sup>58</sup> 同前註，頁277。

<sup>59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又乙巳秋書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279。

<sup>60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又乙巳春書之二〉，頁276。

<sup>61</sup> 同前註，頁277。

「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」，在於一味地以純然道體標舉三代之治，而不能以權變的眼光來看漢唐歷史，以致於以銀為鐵。可是陳亮並非隨意地講時通權變，畢竟通變或是行權，是指不同情境來講的，事實上權變仍須歸於正，不能流於詭譎狡詐：「孔氏之家法，儒者世守之，得其粗而遺其精，則流而為度數刑名；聖人之妙用，英豪竊聞之，徇其流而忘其源，則變而為權譎縱橫」<sup>62</sup>、「故君子行權於正，用智以理，若庖丁之解牛」<sup>63</sup>得粗而遺精，徇流而忘源，當非陳亮所贊同。反過來講，權正與否，則歸於心，心正則權亦正：「夫人心之正，萬世之常法也，苟其不役於喜怒哀樂愛惡之私，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。」<sup>64</sup>人心之正為萬世之法，如此一來，即便是曲折萬變亦不能離其宗，故曰「而周道常如砥也」。

若是如此，人心又該如何得正？這就要回到《六經》來求，經是治心之根據，陳亮之所以論史必歸源於經，其因在此。陳亮說《禮記》三百三千之儀，「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，心不至焉，而禮亦去之。盡吾之心，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」；又說《春秋》是「文、武、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人心者也」；順民之心，因時之宜，則是《書》；《詩》故此天下復性情之正，則是聖人之心所在。<sup>65</sup>上述所言，以經治心，或言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，又或是復性情之正，講究正心，於是可見。

陳亮論王霸之辨，至此已明。因為就他看來，三代王道是《六經》宗旨，但後來千五百年的歷史，時勢的不同，所以不太可能出現做得盡的三代王道。可是王道不純，不代表漢唐就是無道，事實上漢唐是有道的，這個道則是霸道輔王道之道，王霸雜之，是出於漢唐君王權變得來的成果。與三代相比，雖做得不盡，就某種程度上來講，也算是暗合三代，因此不可謂漢唐只有人欲而無天理、只是霸道而無王道。在這點上，

<sup>62</sup> 宋·陳亮，〈祭呂東萊文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 337。

<sup>63</sup> 宋·陳亮，〈謀臣傳序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 190。

<sup>64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問答下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 37。

<sup>65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六經發題〉，頁 81-85。

陳亮很明白與朱熹的差異處，他說「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，只是頭出頭沒，偶有暗合，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」<sup>66</sup>，在某種程度上就頗為切合朱熹的意思。<sup>67</sup>因此他才要朱熹理解他的觀點，畢竟事實就是漢唐盛世之所以存在，正在於掌握了某些道，即便這個道是藉由權變而來，可是道就是道，三代之道與漢唐之道、王道與王霸雜之，或有程度的高低，卻同樣都是道的一種呈現。這也是他認為自己的說法並非反對朱熹，而是可以彌補朱熹觀點，使其更為完善的原因：「亮所以為縷縷者，不欲更添一條路，所以開拓大中，張皇幽眇，而助秘書之正學也，豈好為異說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！」<sup>68</sup>

另一方面，朱熹大致上也明白陳亮所言，如他說陳亮之意：「而其所以為說者，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，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，但有救時之志，除亂之功，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，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」<sup>69</sup>，就對陳亮之說頗為中契。<sup>70</sup>只是朱熹並不認可陳亮說的權變，講權變畢竟變數太大，即便是權近於正，正的標準為何？恐怕也是言人人殊，因此權變很容易流於私慾者的藉口，甚至合理化自己的行為，自以為是行正、做一套說一套：「然世間事，思之非不爛熟，只恐做時不似說時，人心不似我心」<sup>71</sup>、「竊恐後生傳聞，輕相染習，使義利之別不明，舜

<sup>66</sup> 宋·陳亮，〈又乙巳秋書〉，頁 279。

<sup>67</sup> 所謂的「某種程度」，是指陳亮理解朱熹「偶有暗合」、「利欲場中走」的意思。但朱熹並未全部否定霸道功業，李明輝早已指出，朱熹對霸者亦多有肯定，只是這種不自覺的「暗合」並不可取，畢竟就客觀功業而論，漢唐或可視為道的不自覺實現，因為道之運行未必皆出於人之自覺。是以就王、霸的嚴格區別而言，非出於存心自覺者，就不能是王道。李明輝，《孟子重探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1），頁 54-58。

<sup>68</sup> 宋·陳亮，〈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〉，《陳亮集》，頁 281。

<sup>69</sup> 宋·朱熹，〈與陳同甫八〉，《朱子文集》，頁 1461。

<sup>70</sup> 此處說陳亮與朱熹二人對彼此論點頗為了然，但不代表二人就沒有誤解。況且除了觀點之外，兩人攻擊對方人身性格之處，亦復不少，像是朱熹認為陳亮缺乏道德修養，陳亮也說朱子眼界過於狹隘，缺乏知人之明：「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，而教以醇儒自律，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？」可參美·田浩著，姜長蘇譯，《功利主義儒家——陳亮對朱熹的挑戰》，頁 82-93。

<sup>71</sup> 宋·朱熹，〈答陳同甫書二〉，《朱子文集》，頁 1455。

蹠之塗不判，眩流俗之觀聽，壞學者之心術。」<sup>72</sup>又或是貪圖權變，不願意踏實做工夫：「一時英雄豪傑之士，或以資質之美，計慮之精，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亦蓋有之，而其所以為田地根本者，則未免乎利欲之私也。而世之學者，稍有才氣，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、聖學功夫。」<sup>73</sup>影響所及，容易變成只看結果，不問手段，以為由此入手便可見效，不須再有省察靜心工夫，這是朱熹所擔憂的：「江西之學只是禪，浙學卻是功利。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，無可摸索，自會轉去。若功利，則學者習之，必可見效，此意甚可憂！」<sup>74</sup>學者習之，必可見效，但若習得卻是詭譎辯詐，還自以為是識時通權，豈不堪憂？所以朱熹才主張取法乎上，畢竟「夫人只是這箇人，道只是這箇道，豈有三代漢唐之別？」<sup>75</sup>正因如此，朱熹就要以最高標準來講：

但古之聖賢，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，所以能執其中，徹頭徹尾無不盡善。後來所謂英雄，則未嘗有此功夫，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，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，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，然其或中或否，不能盡善，則一而已。<sup>76</sup>

有鑑於權變之流弊，所以朱熹才要以盡善、以惟精惟一工夫來要求。關於此點，我們可以從朱熹批評伊川「權只是經」「反歸於經」之說，再來探討。朱熹反對程頤將經與權視為同性質的概念，他認為應該嚴格區分二者：「權與經，不可謂是一件事物。畢竟權自是權，經自是經。」<sup>77</sup>權是權，經是經，兩者不是同一事物，當然朱熹也不否定權，他認為「權，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，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」，權，是常理所行不得、是不得已而用的，但他接下來又說：「權得其中，固是與經不異，畢竟權可暫而不可常」，<sup>78</sup>一方面說權經不異，一方面又說權只可暫，

<sup>72</sup> 宋·朱熹，〈答陳同甫八〉，頁 1465。

<sup>73</sup> 同前註，頁 1462。

<sup>74</sup> 宋·黎靖德編，《朱子語類》，頁 2976。

<sup>75</sup> 宋·朱熹，〈答陳同甫八〉，《朱子文集》，頁 1464。

<sup>76</sup> 宋·朱熹，〈答陳同甫九〉，《朱子文集》，頁 1466。

<sup>77</sup> 宋·黎靖德編，《朱子語類》，頁 987。

<sup>78</sup> 同前註，頁 990。

其中所透露之權與經的關係，根據林維杰的分析，朱熹認為經本來就可運用在現實處境上，可謂之常，並不是都需要權宜通變，經之所以為經，其特質便在於此。不過在某些特殊情況，便有變通的可能，如「嫂溺援之於手」之類，面對這種不得已的情境，當有權宜之舉，這也是符合經的要求，所以朱熹才說：「權者，乃是到這地頭，道理合當恁地做，故雖異於經，而實亦經也。」<sup>79</sup>經本身便存在著變通的可能性，這樣的經才是真正合於道的經，不得已之權早已包含於經，故曰：「權得其中，固是與經不異。」<sup>80</sup>話雖如此，這種不得已之權，基本上必須是合於「經」，權與經不異，才是真正合理合適的權。朱熹認為漢唐非王道，也是因為他們的「權」，並不符合「經」，更非「不得已之權」。如前所言，漢唐皇帝所作所為是出於人欲，他們所謂「仁義」，都只是包裹著自私自利之心的外衣而已，所以陳亮把漢唐視作通權達變，亦有道存焉，甚至於將史視為經的延續，就很難為朱熹所同意。<sup>81</sup>

朱熹不同於陳亮之處，不止於此，還在於他不贊同陳亮「道—經—史」之說。他認為道確實存於《經》，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，是以道在三代，正為天理所行，<sup>82</sup>所以人應該切實下工夫，體認貫通於天道，<sup>83</sup>若

<sup>79</sup> 宋·黎靖德編，《朱子語類》，頁 988。

<sup>80</sup> 林維杰，〈知行與經權——朱熹哲學的詮釋學模式分析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 27 期（2005.9），頁 205-208。

<sup>81</sup> 在朱熹與弟子的對話中，也可以見到類似的意思，他說：「今未曾理會得正心、修身，便先要治國、平天下，未曾理會自己上事業，便先要『開物成務』，都倒了。孔子曰：『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』，亦是甚不得已，方說此話。然須是聖人，方可與權。若以顏子之賢，恐也不敢議此『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緇』，而今人纔磨便磷，纔涅便緇，如何更說權變功利？」宋·黎靖德編，《朱子語類》，頁 1848。朱熹的看法，與二程雷同，《河南程氏粹言》記：「世之學者，未嘗知權之義，於理所不可，則曰姑從權，是以權為變詐之術而已也。夫臨事之際，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，是之謂權，豈拂經之道哉？」宋·程顥、程頤，《二程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），頁 1176。

<sup>82</sup> 宋·朱熹，〈答陳同甫八〉，頁 1464。

<sup>83</sup> 傅玲玲就指出人們體證天道有「至」與「不至」的差別，後者即是「人道息」，「人道息」即天道在人之不行也，故種種人事功業（諸如漢唐皇帝）不過就是架漏度日、牽補過時而已。傅玲玲，〈從朱熹與陳亮之辯論論朱

要從史求道，則未免迂曲難行：「聖賢以《六經》垂訓，炳若丹青，無非仁義道德之說，今求義理不於《六經》，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，亦之甚矣」<sup>84</sup>「《六經》是三代以上之書，曾經聖人手，全是天理」<sup>85</sup>、「今看來漢唐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，便直是說夢」<sup>86</sup>，就他看來，陳亮的問題，是論史太多，貪多務得，<sup>87</sup>以致於不合於六經大道，「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。」<sup>88</sup>當然朱熹並不反對史書，他也說：「經書正須要讀，如史書要見事變之血脈，不可不熟。」<sup>89</sup>朱熹都看重經書、史書，並不完全貶低偏廢某方，只是兩相比較，經書重要性則遠大於史書，<sup>90</sup>是以經與史，自不該同等而論：「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，史是皮外物事，沒緊要，可以筭記問人。若是經書有疑，這箇是切己病痛，如人負痛在身，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。豈可比之看史，遇有疑則記之紙邪！」<sup>91</sup>經是切己事，相較之下，史不過是皮外物而已，一內一外，經勝於史，此即朱熹陳亮不同之處，也是他們爭論王霸的重要因素。<sup>92</sup>

---

熹的價值觀》，頁 63。

<sup>84</sup> 宋·黎靖德編，《朱子語類》，頁 2952。

<sup>85</sup> 同前註，頁 190。

<sup>86</sup> 同前註，頁 2350。

<sup>87</sup> 朱熹就批評陳亮這一類的人：「向時有一截學者，要讀《周禮》、諸史、本朝典故，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，少刻身己都自恁地顛顛倒倒沒頓放處。」見同前註，頁 190。

<sup>88</sup> 同前註，頁 2966。

<sup>89</sup> 同前註，頁 2866。

<sup>90</sup> 自宋以來，經與史相較，則認為經精而史粗，經正而史雜，這種陋史而榮經的說法，屢見不鮮。到了清代乾嘉漢學，經史之爭亦多所可見，可參余英時，《中國文化史通釋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 115-117。

<sup>91</sup> 宋·黎靖德編，《朱子語類》，頁 189。

<sup>92</sup> 彭國翔研究朱熹的讀書法，認為朱熹對於「經」的態度，不同於「史」「子」。因為在朱熹的想法中，「經」具有「聖典」「聖書」的性質，只要後人認真讀經書，體貼聖人之意，從「文字間求之」，便會發現聖人之言「句句皆是」。彭國翔，《儒家傳統的詮釋與思辨——從先秦儒學、宋明理學到現代新儒學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 102、91-93。

#### 四、結論

陳亮經學，一向為學界較少注意的環節，其實《六經》甚為陳亮所尊崇。畢竟《六經》明變，乃當年孔子之志，因此他仿倣王通，以論史來續經，承繼孔子，於是「論史—續經—明道」就變成了環環相扣的連續效應，不可躐等。他與朱熹論王霸，即是秉此思路而來，至於漢唐諸史之所以暗合三代，正是陳亮在歷史中看到他們通權度變以求經旨，諸如漢唐君主許多行為施政是符合義理的，這是他們本於英雄之質，上窺三代之道（三代之道存於《六經》），然後在適應於當代時勢下的因權適宜。雖然無法做到如三代般盡善盡美，但不管如何，依然有道存在，因此自三代以後的千五百年間，就不能如朱熹等人所說，都是人欲橫流、天理不行。最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，若然如朱熹之言，漢唐只有人欲而無天理在，那這千五百年間，為什麼漢唐還能維持政權這麼久？為什麼人物還能賴以生息、天地還能依舊運行？仔細觀看這段歷史，又怎能說漢唐沒有道存在？所以在漢唐幾百年的歷史中，說沒有道存在是不大可能的。

只是這樣的漢唐之道，並非如理學家說的毫無利欲，也非《詩》、《書》中潔淨純白。相較於三代之道，漢唐只能說是做得不盡，有本領無工夫。可以這麼說，道在《六經》，尚可說是潔白無疵，可說是做得盡、有本領亦有工夫，但當道落在千百年的具體歷史之中，時移世易，事物變遷，難免要行權通變，因此就產生了落差。陳亮在〈又乙巳秋書〉裡便一再反問朱熹：

秘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欲，都無要富貴底人，今《詩》《書》載得如此潔淨，只此是正本子。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潔淨，革道止於革面，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。聖賢建立於前，後嗣承庇於後，又經孔子一洗，故得如此潔淨。秘書亦何忍見二千

年間世界塗澆，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，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？……。點鐵成金，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，不是只靠「這些子」以幸其不絕，又誣其如縷也。<sup>93</sup>

朱熹取法乎上，識得最高標準，用意是避免行權的流弊，因此陳亮說像是孔子編修《六經》，是洗得如此潔淨，朱熹等人標舉此道，是可以理解的：「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，使光明寶藏長長（按：應為「常常」）發見。」可是人心有許多不潔淨也是事實，人有邪正，事有善惡，所以歷史上才有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充斥其中，《六經》當時的歷史又何嘗不是如此？只是經過聖賢洗刷過後，才見得潔淨精粹，後世諸史無此福緣，<sup>94</sup>當然顯得不夠光明純白。可是人心依舊不潔不純，並不因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，是故陳亮才主張正心、權行於正。況且就他看來，不會只有理學家見得三代之道、光明寶藏獨於少數儒者得之，歷史上的許多英雄豪傑同樣也能見道，只是他們或通權應變，或審時度勢，雖使得三代之道不能完全顯現於當世，卻仍然頗有契合之處。不管如何，都不能無視他們所為、將其排除：「亮以為：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，眼光如黑漆，有時閉眼胡做，遂為聖門罪人；及其開眼運用，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，天地賴以撐柱，人物賴以生育，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為盲，無一分眼光，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為偶合，其實不離於盲。嗟乎，冤哉！」<sup>95</sup>開眼閉眼明顯不同，豈可認為他們都是眼盲？當他們「開眼」之時，確實也造就了盛世，大開一世國運，漢唐就是最佳例證，豈可謂這些都是偶然合於道，不足為觀？陳亮不肯心服，其因在此。

<sup>93</sup> 陳亮，〈又乙巳秋書〉，頁 279-281。

<sup>94</sup> 這個說法，也解決了陳亮理路上可能出現的問題：史是權變的展現，其實經也是，為何同是通變，經之道卻高於史之道？經是王道，史卻是霸王道雜之？陳亮的回答是：「聖賢建立於前，後嗣承庇於後，又經孔子一洗，故得如此潔淨。」

<sup>95</sup> 陳亮，〈又乙巳秋書〉，頁 279。

## Chen Liang's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the Xin-Xue

Jhih-Ching Liu<sup>\*</sup>

### Abstract

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meaning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en Liang's perspective on the Xin-Xue. To Chen Liang, Xin-Xue is the book of dao (truth) which could help people understand history. Therefore, studying the Xin-Xue becomes a metaphorical way to live with one's time harmoniously. I would argue that such philosophy could be the major reason separating Chen Liang from Zhu Xi when it comes to the studies of the Xin-Xu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history.

**Keywords:** Chen Liang, Xin-Xue, hegemony, Zhu Xi, Wang Tong

---

\* Ph.D. Student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